

## 浅析沙特阿拉伯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与策略

杨 毅

**内容提要**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立场十分引人注目。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对石油生产构成了制约，对沙特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基于此，沙特确定了它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基本立场。但由于自身的影响难以左右谈判的发展方向，因此该国时常采用“同步前进”、反复宣传“负面影响”、推迟谈判、对程序性规则作出自己的解释等杯葛策略，来表达和维护自己在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和诉求。

**关键词** 国际关系 气候变化 沙特阿拉伯 负面影响 杯葛策略

**作者简介** 杨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100089）。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主要的全球环境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使地球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吸收能够达到平衡。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而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事关国家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因此，在谈判制定《公约》及其后一系列法律文件的过程中，要求保护气候系统与要求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一对矛盾。这实际上是贯穿整个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问题。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谈判实际上已成为各主要国家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科技、环境和外交等领域的综合较量。

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形成了以欧盟、“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三大利益集团。这三大集团之间的角逐决定了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格局。其中“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它们强调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历史和现实责任，应当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同时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来设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限排温室气体义务。但由于这个集团过于庞大，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以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强调自身的经济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它们担心减排、限排措施会影响其石油生产与出口，对气候变化谈判采取消极的态度，或要求国际社会给与必要的资金援助，以适应在新的气候协议下矿物燃料的需求大幅度减少而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沙特阿拉伯的角色定位

从1990年联合国启动国际气候谈判开始，这一进程就涉及到了各个国家的切身利益，而各个国家在权衡各自的利益、确定谈判立场的过程中又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对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立场的形成原因，国际学术界通常采用由德特勒夫·斯普林兹（Detlef Sprinz）和塔帕尼·瓦托伦塔（Tapani Vaahoranta）提出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分析模式。他们认为生态脆弱性和减缓成本是决定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的立场和政策的两个关键因素。一个国家如果受到环境问题的影响越大，它就越愿意参与该问题的国际谈判；一个国家如果在解决该环境问题时付出的成本越高，它就越不愿意参加该问题的国际谈判。根据这一分析模型，作者将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的表现分为4类：推动者（Pushers）、态度消极者（Draggers）、旁观者（Bystanders）和中间摇摆者（Intermediates）。

从沙特阿拉伯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所采取的方式来看，它扮演的就是类似于“态度消极者”的角色。沙特阿拉伯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363亿吨，占世界储量的26%，是世界上探明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石油和石化工业成为该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据统计，沙特2009年原油平均日产量920万桶，石油出口收入1347亿美元，约占财政收入的86%。该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便源于减排政策对该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沙特代表在谈判中

经常公开表示要“杯葛”（由“boycott”音译而来，有抵制之意）谈判的进程。而国际社会也注意到了沙特的这一立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出口部门理应在温室气体减排上采取必要措施，这也必然导致它们比那些正在推进减排措施的发达国家要承受更大的代价。<sup>①</sup>而且，按照该委员会的预估，减排措施的推广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对石油产品的依赖，这将带来油价的下跌，从而影响产油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sup>②</sup>因此，对产油国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不同态度的国家分类

		生态脆弱性	
		低	高
减缓成本	低	旁观者	推动者
	高	态度消极者	中间摇摆者

Source: Detlef Sprinz, Tapani Vaahoranta, “The Interest – Based Expla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1, Winter 1994, p. 81.

沙特阿拉伯始终关注与减排成本相关的那些负面因素，关注着对其经济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沙特在宣布批准《京都议定书》之时，该国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纳伊米（Al Naimi）就曾预测，到 2010 年，随着工业化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的推进，沙特每年的经济损失至少为 190 亿美元。<sup>③</sup>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大力推进的新能源政策，减少了对矿物燃料的依赖，也招致沙特等产油国的不满，成为沙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立场的主要依据。而且从历史上看，沙特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就持一种怀疑的立场，它更多的是强调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不确定性，从而低估它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沙特政府不断强调气候变化协议绝不能成为能源协定。这一点对各国谈判代表来说不言而喻，沙特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最大努力，表明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对其自身已构成了严重威胁。

①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 11.

② Ibid.

③ “Saudi Government Approves Kyoto Climate Protocol”, *Reuters*, 21 December 2004.

## 沙特阿拉伯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 基本立场及行动方式

面对着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对沙特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沙特利用自身的影响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凸显自己在这问题上的立场。

### （一）突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负面影响”

在一个“限碳”的世界中，沙特对确保自身经济发展保持关注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中也承认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特殊境遇，包括那些国民收入高度依赖燃料生产的国家。《京都议定书》也承认这种状况的存在。在后《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沙特阿拉伯的立场主要通过对应对气候变化措施“负面影响”的争论体现出来的。作为这一争论的主要内容，沙特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该国石油出口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力图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中能够获得一种特殊对待。在这样的议事日程以及更加广泛的谈判范围内，沙特鼓励继续使用石油的方式并积极促进通过非能源的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比如碳捕捉和储存技术（CCS），取消煤炭补贴，调整煤炭消费税等。

与“负面影响”相关的议事日程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1996年底，在《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关键时刻，由于沙特不断抱怨减排目标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大会主席号召就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展开建设性的协商。其结果就是提出了一项计划，旨在对经济发展受到减排政策带来负面影响的国家提供相应的财政补偿，这一计划是由伊朗、科威特、尼日利亚、沙特、阿联酋和委内瑞拉等欧佩克国家共同提出的。但那些接受了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对于这一补偿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气候变化协定的适用范围，提出该计划的这些国家并不是为了实现他们名义上要求的目标，而仅仅是为了阻挠各国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

在《京都议定书》出台后，围绕“负面影响”而展开的议事日程成为沙特阿拉伯采取更加合作性的谈判策略的基础。沙特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它愿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让步，修正或按比例降低它们的要求，以此与国际社会求得一致。针对相关议题，沙特集合相关国家召集了工作组，并举行专

家会议，他们主张要确保这些国家的经济具有更大的“收缩余地”，在确保经济多样化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协助这些国家化解财政风险，而不再单纯给与简单的经济补偿，通过上述方式，力图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确保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

但是，“负面影响”很多时候又成为沙特加以利用的一种杯葛气候变化谈判的方法。这方面最主要的事例表现在它对气候变化所产生影响的适应问题上。在《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初始阶段，沙特试图将自己的立场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普遍立场联系起来。<sup>①</sup>通过发掘这样的联系，在工业化国家关注有限的情况下，沙特确保了它能够获得七十七国集团的足够支持。事实上，发达国家曾承诺要援助发展中国家，使其能够适应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然而，这一联系对气候变化谈判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后果，沙特时常按照它自己对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关注程度来决定它对相关进程的支持程度。

## （二）组建跨国政治联盟

沙特的杯葛立场应该被置于气候变化政治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内部强大的石油和煤炭游说集团结成了联盟。在这个意义上，沙特与那些反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强有力行动的矿物燃料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些利益集团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更增强了沙特手中的筹码。在气候变化会议举行的同时，欧佩克国家的代表们也在不断与发达国家知名的游说集团进行沟通，而且那些得到良好资助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会为这些欧佩克代表们提供战略和司法上的建议。在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之后，沙特和美国的代表常常以同一立场来反对该协定，彼此之间似乎有了一种默契。

在正式场合，沙特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和欧佩克的架构内展现它的立场的。这两个组织虽然很少开展正式的合作，但它们的成员国则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立场，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国际气候谈判上采取一个统一的政策。但在欧佩克这一规模更大的组织内部，成员国的立场迥然不同。虽然像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一些非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也时常支持沙特

---

<sup>①</sup> Suraje Dessai, “The Special Climate Change Fund: Origins and Prioritisation Assessment”, *Climate Policy*, Vol. 3, No. 3, 2003, pp. 295 – 302.

的立场，但这种支持绝不是盲目的追随。

决定着沙特采取行动的更为重要的动力是它与以七十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七十七国集团在联合国的诸多会议及论坛中，时常自己内部先协调好谈判立场。欧佩克国家是七十七国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其中的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伊朗、委内瑞拉和卡塔尔在过去十年间曾经分别担任过联合国大会的主席，这也大大提高了欧佩克国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七十七国集团立场的影响。

同时，气候变化产生的负面后果威胁到了许多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的生存与发展，例如，气候变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海平面的上升，将使那些岛屿国家面临灭顶之灾，而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更让那些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sup>①</sup>但沙特的国家财富能够有效地帮助这些国家度过一时的经济难关，通过向这些贫穷国家提供财政上的援助，获取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上的支持。也就是说，沙特在气候变化机制之外与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除了直接的物质补偿外，沙特还依靠自己在气候谈判中强有力的协调能力和沟通技巧与七十七国集团建立了信任与合作关系，特别是巧妙地利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以及希望七十七国集团保持团结的强烈愿望。因此，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展缓慢、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给与发展中国家援助有限、缺少关键技术转移措施，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都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杯葛措施创造了便利条件。<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沙特的立场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程序性的推脱反映了发展中小国在有效参与谈判过程中真正面临的困难。它们对减排政策所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的强调也唤起了诸多发展中大国的担忧。因此，沙特阿拉伯有时担当起了这些国家的“传声筒”。

可以说，沙特与七十七国集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针对那些发展中国家积极倡导，甚至已经超越了气候变化机制之外的议题，例如技术转

---

<sup>①</sup> 参见詹世明《应对气候变化：非洲的立场与关切》，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10期，第43页。

<sup>②</sup> Bo Kjellén, *A New Diploma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77.

移、财政支援以及发展中国家报告制度等，沙特通常保持最大限度的沉默。对待发展中国家有关气候议题承诺的关键问题，沙特采取了积极行动进行反对。而在针对那些七十七国集团没有形成一致立场或者从传统上他们就不予关注的问题上，比如“负面影响”或船用燃料等问题，却正是沙特特别关注的。由于七十七国集团能够容忍沙特的主张，沙特也在追求它的利益主张上完全依靠七十七国集团的帮助。

沙特在气候变化机制的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SBSTA）、附属执行机构（SBI）的会议上，以及预期成效较低的缔约方大会上表现得最为积极，而在那些会作出重要决议的会议上，沙特则不愿发挥积极作用。七十七国集团的代表同其他国家集团的代表一样，在重要的谈判阶段，他们积极参与且有备而来，这种情况下，他们经常进行更高层级的协商，这时沙特可操纵的空间也就显得更加狭小。

### （三）最大限度发挥沙特代表团的影响力

沙特派出的谈判代表通常是训练有素的。目前，该国气候谈判代表团负责人穆罕默德·奥萨玛（Mohamed Al Sabban）由于能够找准时机将该国所主张的议程进一步向前推进，因而声名显赫。有人评价他具有“自信、坚韧、雄辩的口才、流利的英语，以及对手头待处理的事务拥有深邃的知识和理解能力”<sup>①</sup>，这些他具有的特点使之能够在谈判中施加有力的影响。有人认为是“拥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知道如何搅乱谈判计划并延缓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人。”<sup>②</sup>

沙特代表团的规模是中等的。自2002年以来，沙特在附属机构的会议上一般派13名成员参加，在缔约方大会上则有大约18名代表团成员出席。这一规模也是按照沙特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确定的，但这一代表团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们在内部立场协调上取得了一致。这将有助于增强代表团谈判的效率，同时保持沙特在气候谈判上立场的一致。例如，奥萨玛自1991年以来参加了每一次气候变化议题的谈判，这在政府代表团中是绝无仅有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纳伊米也自1998年就开始代表沙特参加了全部缔约方大会。而且石

<sup>①</sup> Roger Fisher, William Ury and Bruce Patton, *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n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 London: Random House Business Books, 1992, p. 39.

<sup>②</sup> Jeremy Leggett, *The Carbon Wars: Dispatches from the End of the Oil Century*,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1999, p. 227.

油和矿产资源部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纳伊米和奥萨玛都来自该部门，他们的工作人员始终成为沙特代表团的核心。这种由能源部门负责气候谈判事务的情况，在气候谈判机制中也是非常罕见的。<sup>①</sup>

上述情况反映了沙特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经济事务而非环境事务。在沙特看来，撇开经济影响因素，气候变化问题本身充其量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根本不应该在国家政策的高度上予以考虑。它首要关注的是气候变化政策对经济事务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气候变化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意义。

## 沙特阿拉伯的气候变化谈判策略

一般说来，沙特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积极行动。自1999年以来，沙特采取了以下策略，以提升它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

### （一）“同步前进”策略

沙特所采取的一个关键性策略就是“同步前进”的策略。顾名思义，这种策略就是如果沙特代表团在其关注较多的“负面影响”议题上不能取得显著进展时，在其关注程度较低的议题上就会不断公开威胁采取阻挠措施。例如，1999年沙特在有关气候变化负面影响议题协商的谈判达成一致之后，便在另一项关于履行条约的文本上撤回了它原本反对的立场。<sup>②</sup> 2000年，在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沙特威胁如果“大会主席的盟友”组成的团体在相关政策和措施上采取行动，它将不再对建立灵活机制予以支持。<sup>③</sup> 2002年，沙特以涉及“负面影响”的谈判缺乏进展为由，拒绝了随后举行的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谈判。<sup>④</sup> 2007年，沙特警告，如果发达国家不同意其在“负面影响”上提出的要求，它将在其他重要议题上予以阻挠。<sup>⑤</sup>

---

① Joanna Depledge, “Strive for No: Saudi Arabia in the Climate Change Regim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8, No. 4, 2008, pp. 9–35.

② ENB, Summary of the Fif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5 October–5 November, 1999, p. 10.

③ ENB, UNFCCC COP–6 Highlights, 14 November 2000, p. 3.

④ ENB, Summary of the Eigh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3 October–1 November 2002, p. 14.

⑤ ENB, Twenty–sixth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of the UNFCCC and Associated Meetings, 7–18 May 2007, p. 13.

“同步前进”的关键在于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问题。这一问题不但在正式的谈判中被提及，而且在七十七国集团内部，沙特也不断主张讨论适应气候变化问题。2008 年，沙特一方面坚决主张在援助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转移上使用对等的语言；另一方面，则主张在关于应对措施的影响上是属于关于《京都议定书》谈判最后予以解决的问题。<sup>①</sup>

### （二）反复宣传“负面影响”

沙特针对气候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了“反复宣传”的策略，也就是在这一问题上不断规划出新的议程条款，并不断在其他议程条款内也唤起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在其他议程中坚持聚焦于“负面影响”问题会使正在讨论中的条款陷入僵局。在 2007 年的巴厘岛会议上，由于沙特在评价《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针对“负面影响”采取了坚定立场，其结果是，有关政策及措施的条款在 2008 年最终从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议程中去掉。尽管从表面上看是为了避免重复，但毫无疑问体现了一直寻求淡化这一问题的欧佩克国家的胜利。

### （三）推迟谈判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政策和措施，以及船用燃料等相关的议程条款，都是沙特阿拉伯采取这种措施时的主要关注点。2001 年在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沙特认为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次评估报告的后续工作上难以达成一致，主张推迟这项活动直至下次会议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在其他问题上获得了重要的让步。2001 年初在筹划第六次缔约方会议时，沙特就主张将关于政策与行动的工作推迟到第七次会议进行。而到了 2002 年，它又主张直到下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应推迟在这一议题上达成任何实质性结论。<sup>②</sup> 2006 年，沙特同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反对一项计划中的路线图，认为 4 年之内应将关于政策与行动的条款从相关议程中去除（最终的结果是决定推迟两年）。<sup>③</sup>

---

① ENB, Twenty - eighth Sessions of the UNFCCC Subsidiary Bodies, Second Session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2 - 13 June 2008, p. 16.

② ENB, Summary of the Eigh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3 October - 1 November 2002, p. 6.

③ ENB, Twenty - Fourth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of the UNFCCC and First Session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17 - 26 May 2006, p. 12.

#### (四) 对程序性规则提出自己的要求

传统的杯葛策略就是利用程序性规则来拖延谈判，沙特通过对某些特别的规则作出自己的解读来限制气候变化机制发展进程。例如，在《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沙特对气候变化公约的规则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它认为议定书草案的全部文本在议定书被通过之前应该在成员国中传阅6个月，通过之后就不能作出改动。这样的解释最终被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驳回。<sup>①</sup>许多常规的程序性规则都被沙特要求进行解释或翻译。这样的要求对于非英语国家、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小国而言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英语往往成为一种唯一的工作语言。<sup>②</sup>例如在协商《京都议定书》下的履约体系时，沙特和其他欧佩克国家就拒绝按程序进入草案的一读程序，理由就是传阅的文本只有英文一种。<sup>③</sup>在海牙举办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七十七国集团从程序性角度提出反对，最终使得这次谈判归于失败。仅在一天的协商中，沙特自己就反对提议召集小组会议来研究报告制度、政策与行动以及履约议题。<sup>④</sup>这种对程序性规则的要求对谈判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沙特阿拉伯谈判措施的有效性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沙特的杯葛措施改变了日常进行的气候变化谈判的气氛，如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气候谈判会议上，沙特就与小岛国集团展开了公开对抗，为此也遭到了现场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弹。<sup>⑤</sup>

尽管沙特采取了杯葛策略，但它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有限。在巴厘岛会议上，主要的争执表现在美国、欧盟及发展中大国间，它们决定了谈判的最终结果。这也证明了沙特只是试图在那种低收益的谈判中采取更主动的姿态，而不是在那种事关重大的谈判中发挥作用。尽管如此，沙

---

① Joanna Depledge, *The Organization of Global Negotiations: Constructing the Climate Change Regime*, London: Earthscan, 2005, p. 236.

② Ibid., pp. 236 - 239.

③ ENB, Summary of the Fif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5 October - 5 November 1999, p. 19.

④ ENB, UNFCCC COP - 6 Highlights, 14 November 2000.

⑤ 李雁、吴迪 《直击波恩气候谈判》，载《南方周末》2010年6月1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46390.

特还是在气候变化机制的讨论及其议程设置上，将其反对的议题推向前台进行讨论，采取积极的姿态进行应对，这同它在与“负面影响”相关的问题上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形成鲜明对照。<sup>①</sup>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近几年来，沙特的立场也有些许松动，开始正视气候变化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的挑战。

沙特向气候变化大会递交的第一份反映其国家立场的文件是在 2005 年，暗示沙特的立场会有所变化。这份报告是由沙特负责气象与环境事务的部门起草的，展示出了一种中间的立场。虽然这份报告仍然坚称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会严重损害该国的经济，但它也开始承认沙特也在遭受着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影响，并对沙特自身在气候变化面前的弱点进行了详细讨论，而且针对经济多样化这样的情况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援助方案。另一项大的进展就是 2006 年由沙特发起组织了关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会议。<sup>②</sup> 这表明沙特内部对于清洁发展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开始有了进一步认识。

2007 年底，沙特主办了第三次欧佩克峰会，环境议题成为了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峰会最终发布的宣言对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予以明确认可，认为欧佩克国家有责任来应对这一问题。这次会议强调应考虑石油依赖型国家的特点，从技术层面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这次峰会上，沙特宣布提供 3 亿美元作为基金用于研究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其他欧佩克国家也承诺为这项基金注资。<sup>③</sup>

上述举措说明沙特和其他欧佩克国家至少开始朝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方向迈进，依照自身国家的情况制定一种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但这是否意味着以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开始改变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这种改变是否能够为整个谈判格局带来新的变化，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尚早。

---

① Joanna Depledge, op. cit., pp. 9 – 35.

② Saudi Arabia, *First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Submitted to UNFCCC*, Presidency of 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 <http://www.unfccc.int>, 2005, p. 51.

③ Joanna Depledge, op. cit., p. 30.

## **Brief Analysis of Saudi Arabia's Position and Tac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Yang Yi*

**Abstract:** As the biggest oil producer, Saudi Arabi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is very conspicuous. There i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otecting climate system and maintain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in the action of dealing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adverse effects from the climate change regime, Saudi Arabia has formulated its fundamental position and tactics. Saudi Arabia can not steer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by itself. To express and protect its own interest and appeals, several obstructionist tactics, such as advancing at the same pace, frequent propaganda of the negative influence, postponing the negotiations and making its own explanation of the procedural rules, are used by Saudi Arabia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mate Change; Saudi Arabia; Adverse Effec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